

在北大图书馆见过另一张老地契,上面显示民国十六年一个名叫松海的八旗破落户卖掉了东直门外、光熙门内一块地,面积一亩五分,卖价是三十六块大洋。据所知,那时候北京大学正牌教授的月薪能开到二百六十块大洋,教一个月的书,能买十亩地。

1927年,北大教授一月工资可买十亩地

在北京大兴见到一张老地契,说是民国十年农历十月,大兴康营村一位姓刘的佃户从地主手里买下四亩三分地,总共只花了七块大洋。也就是说,一亩地还不值两块大洋。

大洋的购买力是很强的,但是购买力再强,民国时代一块大洋也买不了一百斤米,撑死了相当于现在两百元人民币。两块大洋呢?最多相当于四百元钱。花四百元买一亩地,是不是白日做梦?真的不是白日做梦,民国时代农村的地皮就是这么便宜。

也甭说农村,就连北京城里的地价都低得吓人。我在北大图书馆见过另一张老地契,上面显示民国十六年一个名叫松海的八旗破落户卖掉了东直门外、光熙门内一块地,面积一亩五分,卖价是三十六块大洋。据我所知,那时候北京大学正牌教授的月薪能开到二百六十块大洋,教一个月的书,能买十亩地。

是不是只有北京和北京大兴的土地这么便宜?不是。今年春节我的一个同乡兼同仁从自家老宅里翻出来四十多张地契,从民国十六年的到民国三十六年的都有,看看上面显示的土地成交价,统统低得可怜。

比如说民国二十五年三月,杞县高阳乡一位名叫刘宪起的农民购买本村蔡韩氏的土地,总共五亩地,一百块大洋成交。民国三十五年七月,刘宗

起又从本村张瑞云手里买了三亩地,四万七千元成交。四万七千元好像很贵,可它不是大洋,是法币,而民国三十五年已经是抗战后了,法币正在严重贬值,用购买力折算的话,四万七千元法币最多相当于现在几千块人民币。

民国三十年,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了《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》一书,该书第六章第一节列举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平均地价,全部折合成大洋,贵州每亩地不到一块钱,甘肃每亩地不到十块钱,河南每亩地十三块钱,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平均地价最高,也才五十块大洋一亩。由此可见,那个时代地价低廉已经成了普遍现象。

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?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,土地的产出太少,而税费成本却太高,经营土地极不划算,故此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。吴组缃在短篇小说《一千八百担》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: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,每年收些利息,后来油坊破产,油坊主自杀,商人去要债,油坊主的家人说:“要钱没有,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?”商人说:“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,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,我要的是钱,要你的地干嘛?”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:“这年头,地是个倒霉东西,是个瘟神,谁见了谁怕!”您瞧瞧,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,当然只能

便宜卖了。

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。民国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,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,其他地方基本破产,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京非常不值钱,放在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。以上海为例,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,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,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。还有广州,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,论井(折合十多个平方米)出售,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。跟其他地方几十块大洋甚至几块大洋一亩的地价比起来,广州、上海的地价贵了几万倍!

为什么这几个大城市的地价会这么贵?因为它们商业繁荣、交通便利、教育发达、文化先进,又没有土匪横行,有钱人都往那里挤,土地当然紧张,地价当然暴涨。

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流行批斗大地主,其实从经济上讲,农村的大地主远远不如大城市里的小地主活得划算——只要你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块地皮,把它租给开发商盖成房子(民国流行租地建房),就什么都不用管了,哪怕天天睡大觉,也能源源不断地收到惊人的租金,等租期一满,甚至还能把开发商盖的那些房子无偿收归自己名下(这也是民国时的惯例)。

(据《南京日报》)

民国女子眼中的八大帅哥



民国时期,风云际会,诞生多少英雄豪杰名流绅士!那么,民国时期公认的美男子有哪几个呢?

张自忠,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军衔的将领,史称抗日第一将领,英气逼人。弥留之际留下最后一句话:“我力战而死,自问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长官可告无愧,良心平安!”血染的风采永留青史。

张学良,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。曾与杨虎诚发动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,周恩来对其评价是:“民族英雄、千古功臣”。他风流倜傥,一生蒙无数红颜厚爱,晚年写有自传讲述与十一个情妇的故事。与红颜赵四小姐的故事最为人称道。

张灵甫,是北大才子,投笔从戎,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。长得俊美刚毅,玉树临风。不仅精通兵法,爱好马术,还擅长书法,能诗善词。

胡适,新文化运动史不能绕开的人物,清秀俊逸,温文儒雅,令无数女子折腰,连一个美国女人都为他终身未嫁。

袁克文,袁世凯的次子,1890年7月出生于朝鲜汉城,与父亲的秉性大不相同,潇洒风流,十分热衷于中国的传统文化,对政治漠不关心。

周恩来,南开才子,留学法国,中外公认的美男子,辅佐毛泽东夺得江山。同时在国民党中也享有很高声誉。

瞿秋白,翩翩书生,英气勃勃。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,也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宣传家和文学家。他第一个翻译《国际歌》,也是唱着这首歌在36岁那年从容就义。

梅兰芳,江苏泰州人。闻名世界的京剧表演艺术家,以旦角表演而成“梅派”,年逾60尚能粉墨登场,迷倒整个民国的美男。

(据新华网)

对风流老公很宽容的民国美女

1921年7月下旬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,陈公博作为广州的代表是最后一位报到的。当时,李励庄与陈公博刚新婚不久,于是李励庄陪同陈公博出席了这次的会议。

不介入丈夫的政事

李励庄的丈夫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。他是中共一大代表,尔后脱党而去,跻身国民党行列,以“左派”自诩。后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的代表人物,但不久又与蒋介石合流,是蒋介石的座上客。最后,他追随汪精卫,叛国投敌,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。

李励庄并不介入陈公博的政事,而且对丈夫的情妇十分宽容。打入汪伪内部的我党特工李时雨回忆李励庄说:“她鹅蛋脸,皮肤白皙……很稳重,不多说话,与长期居家的陈的姘妇何大小姐关系挺好。”而且,她对陈公博的另一情妇莫国康的关系也很好。

陈公博的情妇何焯贤、何炳贤两姐妹生活奢侈,挥金如土,跟随陈公博纯粹是看中他的地位和金钱,在政治和工作上对陈公博没有任何帮助。惟

有他的私人秘书莫国康,不仅是陈公博的红颜知己,还是他政治上的得力助手。别人都知道她与陈公博的关系,但是也知道她的地位,背地里视她为陈公博的小老婆,当面还是得称她“莫委员”(她是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)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投降。面对当时的局面,陈公博思去想来,最后决定三十六计,走为上计。主意打定后,他便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日本政府,希望逃到日本某一个地方隐居下来。日本政府很快同意了陈公博的请求。1945年8月25日晨,陈公博带着李励庄、莫国康、林柏生、陈君慧、周隆庠等人,乘飞机出逃。

离婚后,她依然希望救丈夫

1946年4月12日,陈公博作为大汉奸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。诉讼期间,陈公博还撰写了全文三万字的自白书,以明心志,但自付劣迹难逃法网制裁,自白书末了称“请法庭随便怎么判,我决定不再申辩”。

陈公博于狱中写的日记流露其心迹:“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,当初心里

是微微的震动了一下,但随即也就不觉得什么了,并不是我有视死如归的精神,只是我觉得我对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,我是可以就此结束了我一生的。”

此时已与陈公博离婚的李励庄在数日后向法院提出“为陈公博声请复判状”,诉状表示,陈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伪政权成立之初,即通过军统人员徐天深的秘密电台,与重庆保持联系。李励庄再三声明丈夫在伪职期间,曾配合重庆方面,报告日军动态,并尽力剿共,根绝赤患云云。李励庄的声请未被当局采纳,仍维持原判。

1946年6月3日凌晨时分,蒋介石侍从室密电南京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,命令迅速执行死刑,陈公博于当天被枪决于苏州。

李励庄和陈公博生有一子,名叫陈干。陈公博临刑的这一天,陈干偕汪精卫之女来到苏州,此时,死刑刚执行完毕。他们没有到刑场,只是嘱托陈公博的副官将陈尸体送到苏州殡仪馆入殓。随后,将陈公博葬至上海公墓,连墓碑也没有立。(据《凤凰博报》)